

民国礼制建筑与

中山纪念

Ritual Architecture of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Cult of Sun Yat-sen

赖德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民国礼制建筑与 中山纪念

Ritual Architecture of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Cult of Sun Yat-sen

赖德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 / 赖德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112-14256-9

I. ①民… II. ①赖… III. ①纪念建筑 - 介绍 - 中国 - 民国
②孙中山 (1866 ~ 1925) - 纪念建筑 - 介绍 IV. ① 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7289号

责任编辑: 李 鸽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张 颖 王雪竹

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

Ritual Architecture of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Cult of Sun Yat-sen

赖德霖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 6³/₈ 字数: 174千字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ISBN 978-7-112-14256-9

(2232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民國礼制建礼与
中山纪念

法霖自署



前言

“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

——《隋书·高祖纪下》

1927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中用“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一语来形容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和所发生的一切。用它来形容150年来中国人造环境的发展似乎也不为过。的确，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外国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入侵，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新的国家政体的形成，中国的城市 and 建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生产制度、知识体系、美学思想、材料结构、功能类型，乃至构造施工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传统的营造业和营造学。探讨这些变化原因、过程和结果因此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基本课题。而新旧矛盾、中外交流、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也就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基本语境。

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建筑类型像礼制建筑一样如此紧密地与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也没有任何其他建筑具有比中山纪念建筑更广泛的社会认知。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民国早期，也即辛亥革命之后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礼制建筑的发展以及与孙中山纪念相关的建筑的历史。

礼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服务于它的建筑物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和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物质与空间表现，它们在各国的建筑史中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类型。考察社会巨变对这类建筑的影响因此也成为建筑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中国传统的礼制建筑包括崇奉天地神祇的坛庙、

祭拜先人和英贤的祠堂，以及埋葬帝王与公卿的陵墓。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伴随社会的变革和信仰体系以及传统习俗的改变，影响中国社会长达 3000 余年的一种礼制建筑传统命运如何？新的国家政权下新的礼制建筑是什么？新的礼制如何影响了新的礼制建筑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设计又是如何从中外传统中寻求借鉴的？

为此，本书追溯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史上体现政权合法性、文化正统性和表达对于国家安全的企盼的天坛、孔庙和关岳庙的兴衰，以及用于表彰忠烈和贤良的祠堂在崇祀对象方面的演变。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传统礼制和习俗对民国墓葬，如袁世凯墓、孙中山墓以及一些先烈墓的影响。本书进一步揭示了民国时期新的纪念物，如纪念碑、纪念雕像、纪念堂出现的历史和它们与一种新的崇奉方式和视觉表达的关联。

笔者以为，较之其他类型的建筑，礼制建筑更体现了历史的书写。它首先反映了信仰与崇拜在一个新时代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还有一些传统礼制建筑被继续使用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但其大部分都失去了原有功能，许多被改造甚至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新的社会的新礼制建筑和纪念物，其中包括英烈祠、英烈墓、伟人墓、纪念碑、纪念像，以及纪念堂。但是，新的礼制建筑和纪念物的出现并非仅仅是一种样式和种类的增加。它们还体现了崇奉方式和对纪念物识别性要求的改变，如从封闭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从碑刻文字的指示，到纪念碑造型的象征和纪念像的形象表现；从地点与时间都是固定的祭祀转向公共空间中“非专注”的接受；从祭祀者对被祭祀对象的崇奉到纪念者接受被纪念者的激励或教导。新的礼制建筑和纪念物也并非凭空产生。为了表达政治、文化上的正统性，一些业主或设计者会自觉向传统礼制建筑寻找依据。当旧的传统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要，或为了挑战旧的制度，表达新时代的政治理念时，另一些业主或设计者又会从外国传统中寻求借鉴。旧新共存、中西交

织，民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和纪念物也因此呈现出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建筑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以及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在建立其新的礼制系统时的多元探索。

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于他的纪念成为了民国礼制建设的核心内容。孙中山成为了一个最受拥戴的崇拜对象，他的遗教成为了最受认同的信仰理念，而对他的纪念仪式也因“纪念周”的推行而制度化。相应的是他的纪念物与纪念空间在中国的普及。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就是民国早期两座最重要的中山纪念建筑。因此，本书又就这两个重要个案进行了专题研究。第二篇“探寻一座现代中国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全面考察了该建筑的设计竞赛过程，以及实施方案在建筑设计上的成就。借助于分析孙中山关于现代中国的理想，19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建筑的史学史，参赛作品不同的历史关联，国民党为纪念孙中山制定的仪礼，以及“唤醒民众”的文化政治和艺术象征等背景，笔者试图论证所谓“中国风格”并非一个既定的造型系统，而是一种开放的话语，在其中，传统因素在世界建筑的语境里被重新审视和评判。中山陵的设计集中体现了关于现代中国式纪念物的不同理念，无论是风格的、功能的，还是象征意义的，它们都是对于新的民族国家的某种表现。

不同于单纯的对于建筑“物”的研究，本书第三篇“中山纪念堂——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首先关注的是纪念堂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在现代中国产生的历史。这种空间将主席台与观众席明确分开，在赋予讲演者在空间的话语权的同时，也通过将观众席有序排列，为讲演者创造视觉上的秩序感。同时，空间以孙中山像和遗嘱为视觉焦点，使得讲演者既可以以观众的领导者的身份向孙中山行礼，又可以以孙中山的代表的名义向观众宣讲。纪念堂因此被看成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它受到西方教堂空间的影响，又服务于一种新的教义的宣传和新的礼仪的开展。笔者进一步对于该建筑以西方希腊十字的平面结合中国风格造型的“翻译”手法进行

了追本溯源的考察。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宣讲空间，中山纪念堂是孙中山“唤醒民众”，即用一种政党的意识形态改造国民这一思想的物质体现。作为一个纪念物，它结合了西方学院派建筑传统与中国风格，表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现代中国的期盼，这就是将东西方文化中的优点相结合。

总之，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和中山纪念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许多重要话题，如新旧转变、中外交流、学院派的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以及中国建筑的历史叙述，因此它们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筑的设计史、思想史，甚至史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笔者相信，本书将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民国以来的礼制建筑，加深了解中山纪念建筑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对于促进现代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重要性。笔者更加期盼，本书可以为现代中国的礼制建设提供借鉴。

目 录

前言

第一篇 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下的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 纪念物概论 1

- 一、坛庙 2
- 二、祠 14
- 三、墓 28
- 四、纪念碑 58
- 五、纪念雕像 71
- 六、纪念堂 81
- 结语 93

第二篇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 97

- 一、孙中山的现代理想 99
- 二、图案竞征 101
- 三、获奖作品 113
- 四、从祭到纪念周 126
- 五、头奖作品 131
- 六、钟形平面 145
- 结语 152

第三篇 中山纪念堂——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 155

- 一、传统聚集空间与现代宣讲空间 158
- 二、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宣讲空间 164
- 三、“翻译”方法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 165
- 四、作为宣讲空间的礼堂与现代中国 176

附录：中山陵祭堂孙中山像基座浮雕正名 181

索引 189

致谢 195

后记 196

第一篇 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下的 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概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

“辛亥革命”是1911年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民国早期则是指辛亥革命之后，或言从中华民国建立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的一段激变历程。如果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那么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建筑类型就是礼制建筑。礼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服务于它的建筑物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和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物质与空间表现。本文试图探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原有的礼制建筑的命运与新的礼制建筑出现的历史。在此，笔者关心的问题是，伴随社会的变革和信仰体系以及传统习俗的改变，影响中国社会长达3000余年的礼制建筑传统有何变化？新的国家政权下新的礼制建筑是什么？新的礼制如何影响了新的礼制建筑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设计又是如何从中外传统中寻求借鉴的？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朝都有其礼制体系。它们既是统治者或当权者政权合法性的证明，也是他们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清朝礼分五种。在吉、嘉、军、宾、凶五礼中，与建筑形制关系最大的是吉、凶之礼。吉礼居首，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据《清史稿》，清初定制，祭有大、中、群祀三等：“圜丘、方泽、祈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

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祀为群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¹ 凶礼则是上至帝后、亲王，下至品官、士庶的丧仪。吉礼对应的建筑是坛庙和祠，凶礼对应的建筑则是陵和墓。

1912年2月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并经隆裕太后代表清廷认可的有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就涉及礼制建筑，其中包括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和第五款“德宗（按：即光绪皇帝）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民国政府在承认清王室对于宗庙和陵寝的保护、修缮与永远奉祀权的同时，也剥夺了它对于其他礼制建筑的控制。从此，新的政权将利用或改造这些旧设施，也要不断创造体现新政权意愿的新设施。

一、坛庙

民国从旧王朝继承的旧的礼制建筑包括坛庙和祠。其中最重要的坛庙是天坛、孔庙和关帝庙。新政权借助于对它们的利用，表达了对政权合法性、文化正统性和国家安全的企盼。

1. 天坛

民国建立之初，如同其他自然崇拜的礼制建筑所遭的废祀命运一样，天坛旧有的宗教性祭天功能曾被暂时放弃，然而，它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仍使其成为若干重要事件的所在。1912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纪念日，纪念事项包括追祭先烈。北京政府原拟就天坛地址，组织纪念会场。后因地方辽阔，整饬不易，

1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八十三，志五十七，礼一（吉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下同）：2484页。

于是仅就坛中祈年殿建设祭坛，为致祭革命诸先烈之所。¹祈年殿设中华民国死事诸烈士灵位（图 1-1），陈设香花酒果，由内务部礼俗司拟定了排班、奏乐、献花果、读祭文、行三鞠躬礼、奏乐和散班等七条礼节。原拟请大总统亲临致祭，国务员陪祭，其他各团体及诸烈士家属俟大总统追祭后准时入内致祭²，然而实际上致祭是由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并未



图1-1 “会员追祭诸烈士后之摄影”。图片来源：《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1月。

亲临。³辛亥革命之后，袁在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受到拥戴而任大总统，乃是由于他在前清政府中的改革经历与他在当时中国政坛上所具有的军事实力，而并非由于他对革命的支持。此时他的缺席就显示出他对革命者的态度。

1913年，民国政府曾划天坛外坛为林艺试验场，以后又建传染病院飞防疫处（原文）、电台于神乐署。⁴不过天坛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象征性并未被遗忘。同年7月祈年殿成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宪法

1 高劳：“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5-10页。

又：1912年国庆日前夕，内政部曾通咨各部院衙门将追祭地点由天坛改为琉璃厂共和纪念会所（见《政府公报》，161号，1912年10月8日），但结果证明该令并未得到遵行。

2 “国庆日追祭诸烈士礼节”，《盛京时报》，1912年10月12日。

3 高劳：“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5-10页。

4 “天坛历史文化”，《艺龙旅行网》，<http://trip.elong.com/tiantan/lishi/>。



图1-2 《天坛宪法草案》起草会会员合影，1913年。图片来源：B. L. Putnam Weale,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New York, 1917. 转引自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无页码、图号。

起草委员会的办公会所（图1-2），因此最初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天坛宪法草案”。草案在1923年经宪法会议三读通过，同年国庆日公布。中华邮政总局曾为此发行了以祈年殿为图案的“宪法纪念邮票”作为纪念。¹

作为其新礼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祀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世凯命令：“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²1914年12月23日的清晨，袁世凯身着传统祭服率众多官员一起在天坛圜丘举行了祀天典礼（图1-3）。

1 见马润生遗著，马任全译纂《马氏国邮图鉴》（上海：Shun Chang & Co., 1947年），图154。

2 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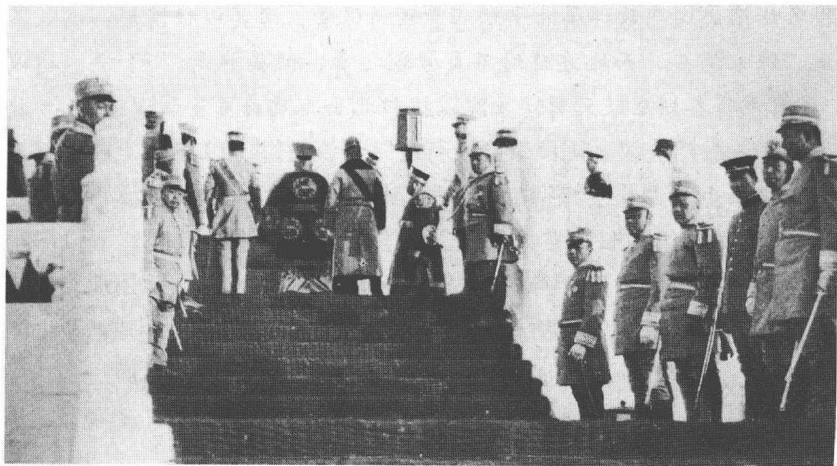


图1-3 袁世凯（中）在天坛圜丘举行祀天典礼，1914年12月23日。图片来源：“President Yuan (central figure) during a period of the ceremony on the Altar of Heaven.” *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vol. XLVI, no.10, Oct. 1915: 无页码。

不过，这次祭天是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随着1916年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伴随中国各代王朝长达3000余年之久的祭天仪式连同祭天场所都变成了历史。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废帝溥仪复位，部队驻扎天坛，遭到“讨逆军”吴佩孚、冯玉祥部围攻，至同月12日张勋败走，天坛几成战场。战事平息后，内务部将天坛辟为公园，1918年元旦正式开放。天坛于是从中国最神圣的礼制建筑转变为民众游嬉的场所。不过其后军阀混战，天坛各处仍多有驻兵。1929年1月，管理人员报告“天坛驻军虽遵照命令停止砍伐树木，但为取暖及炊事，驻军竟扒折墙垣，取墙上垣木烧火，使坛墙损毁多处。驻军还乱占殿堂，所有殿堂亭庙悉为军队占驻，名胜古迹尽成军营，文物雕刻摧残殆尽。”193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北平，目睹各坛庙现状，曾感慨道：“查平市各坛庙，均属具有悠久历史之伟大建筑，足以代表东方文化。此次抵平，就闻见所及，此项建筑多失旧观，长此以往，恐将沦为榛莽，至深惋惜。”

现各坛庙悉由内政部属北平坛庙管理所保管，考其以往情形，腐败不堪，殊未周妥，而地方政府不负管理之责，诚属非是。”于是他建议“所有平市各坛庙及天然博物院以拨归北平市政府负责管理为妥。”此议经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会议通过，1935年，内政部坛庙管理所更名为北平特别市政府坛庙管理事务所，天坛分设管理员驻坛管理。¹同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直隶行政院，下设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简称文整处），由市长和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正副处长，负责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事宜，并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铃及梁思成、刘敦桢等专家为顾问，技术方面还委托了著名建筑师杨廷宝。²包括天坛在内的一些北平古建筑终于避免了“沦为榛莽”的厄运。

2. 孔庙

清代重要的祀典还包括历代帝王庙、传心殿（正中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南向；东周公，西孔子）、先师孔子、元圣周公、关圣帝君、文昌帝君，此外还祭蠡祀枪，京师群祀，直省祭厉。³这些祀典在民国时期大都被废止，但孔子和关帝还继续受到崇奉，同时岳飞也被增祀。

据《清史稿》，“世祖定中原，以京师国子监为大学，立文庙。制方，南向……大成殿七楹，陛三出，两庑各十九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为大祀……三十四年（1908年），定文庙九楹三阶五陛制。”⁴

1 见袁兆晖：“民国时期的‘内坛外园制’”，《紫禁城》，1999年第1期：19-21页。“天坛作为公园对外开放”，《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网，<http://www.trip8848.com/bjy/tt/4609.php>。

2 梁思成：“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护”，1948年，《梁思成全集（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307-313页。

3 详见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2525-2551页。

4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2532-2538页。另参见：“文庙修工大臣等会奏文庙工程办法摺”，《东方杂志》，第5卷，第12期：153页。

除祀孔子外，文庙还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四配”，闵子骞等“十哲”，澹台灭明至周敦颐、二程、邵雍、朱熹等六十九位“先贤”，公羊高、董仲舒、韩愈、司马光、欧阳修、陆九渊、王守仁等二十八位“先儒”。后并祀者及其位次不断有所增加和调整。阙里文庙，“[雍正]八年，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¹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和政府对于孔子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要求打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另一方面，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要求社会具有一个历史久远、基础广泛的信仰和礼乐体系。孔子和儒学于是成为人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一个争论的焦点。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1913年2月，他又以大总统身份通令全国，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师表，亘百代而常新……溯二千年历史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1914年2月7日，他再发大总统令：“崇祀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俭制祭品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该长官主祭。”²同月20日，袁又颁布了《崇圣典例》。³

袁世凯在1914年5月1日废除了《临时约法》。9月25日发布《亲临祀孔典令》，称“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保守。”⁴并于9月28日

1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2539-2540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页。

3 《崇圣典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法令大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504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1页。

(仲秋上丁)，统率文武百官亲至孔庙，身着古祭服，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对孔圣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孔子在民国重新升为大祀。全国各省也都在省会文庙举行了隆重的祀孔大典（图 1-4）。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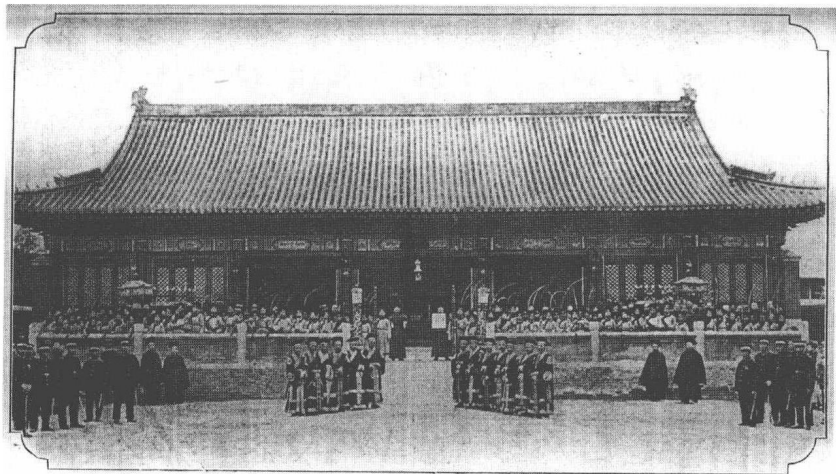


图1-4 天津文庙祀孔演礼。图片来源：《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年10月。

在 1916 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在现代中国的意义成为新旧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该年 8 月，保皇党魁康有为到徐州与张勋共谋复辟。作为舆论宣传的一部分，9 月 5 日他致电段祺瑞：“汉唐宋初，业经大乱俗败，皆以孔教复而郅治。今国体虽异，人道岂殊？而人心坏极，岂政法所及。治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国之公礼。”²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则在 3 个月后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

1 参见宋淑玉：“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9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127-132 页。

2 “公电”，《政府公报》，第 246 号，1916 年 9 月 9 日。